

唐宋历史评论

第四辑

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

包伟民 刘后滨 主编



- | | |
|-----------------------|-----|
| 十余年来中古墓志整理与刊布情况述评 | 仇鹿鸣 |
| 唐代石刻研究杂谈 | 史睿 |
| 马克思主义史学视野下汪篯先生的经济史研究 | 张雨 |
| 试述汪篯先生有关隋唐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贡献 | 冻国栋 |
| 汪篯先生《唐田令试释》读后 | 黄正建 |
| 陈寅恪先生与敦煌学 | 赵和平 |
| 唐代信息研究的特色与展望 | 吴丽娱 |
| 概念、过程与文书：宋代两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周曲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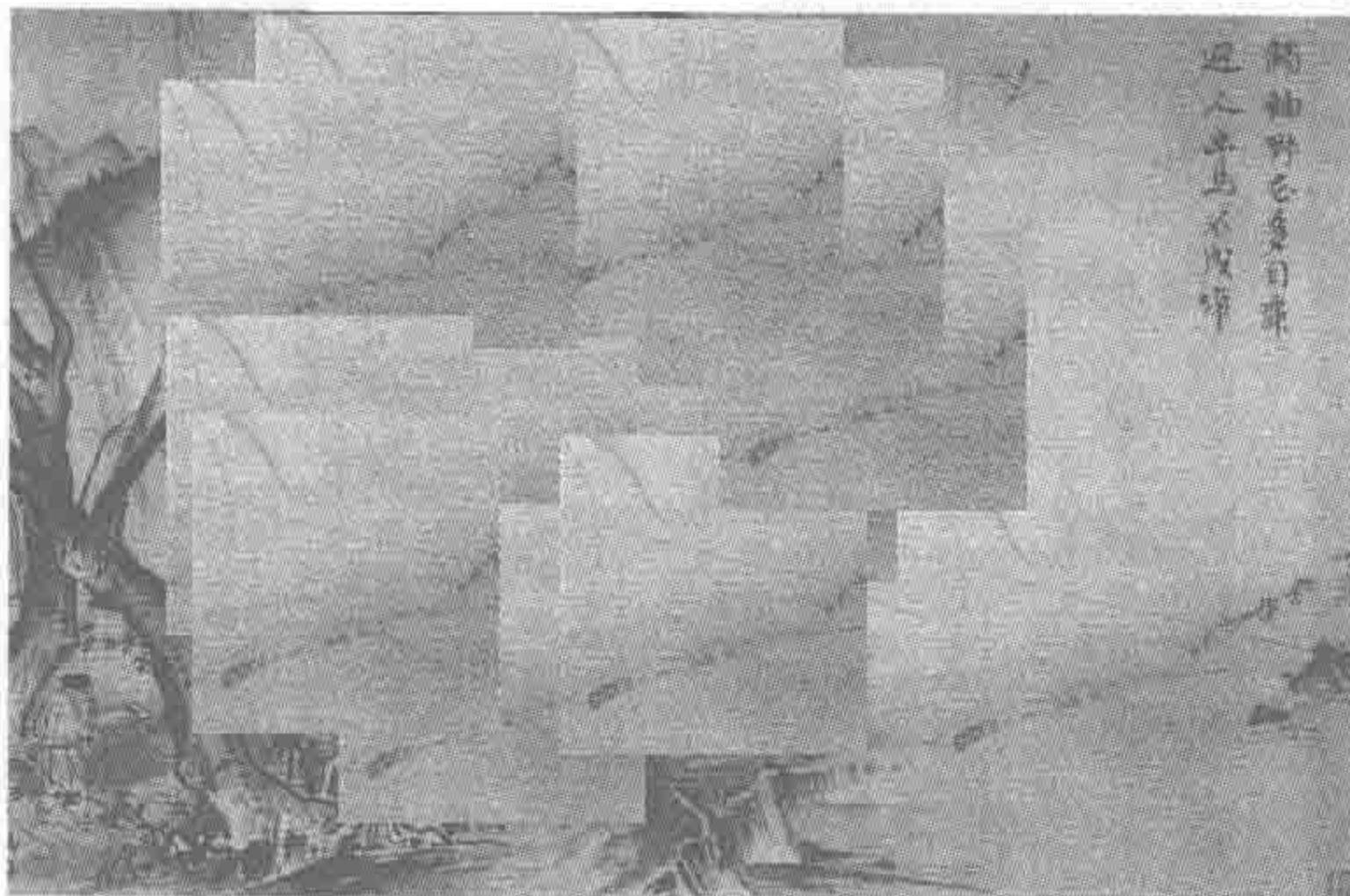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唐宋历史评论

第四辑

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



包伟民 刘后滨 主 编

李全德 王 静 执行编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历史评论·第四辑 / 包伟民, 刘后滨主编.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 - 7 - 5201 - 2702 - 8

I. ①唐… II. ①包… ②刘… III. ①中国历史 - 研究 - 唐宋时期 IV. ①K240.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1396 号

唐宋历史评论(第四辑)

主 编 / 包伟民 刘后滨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李建廷

责任编辑 / 胡百涛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6 字 数：251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2702 - 8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 笔谈 ·

- 十余年来中古墓志整理与刊布情况述评 仇鹿鸣 / 3
唐代石刻研究杂谈 史睿 / 26

· 纪念专栏 ·

- 马克思主义史学视野下汪篯先生的经济史研究 张雨 / 35
试述汪篯先生有关隋唐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贡献
——以隋代户口、隋唐田亩数、唐代丝产地之论考为例 冻国栋 / 56
汪篯先生《唐田令试释》读后 黄正建 / 65
如何应对史籍中遗留的数据
——读汪篯先生《隋唐耕地面积问题研究》 黄承炳 / 72

· 专论 ·

- 陈寅恪先生与敦煌学 赵和平 / 82

- 墓葬所见唐建国元从及其后裔 卢亚辉 / 106
写在身体上的宋政权成立宣言
——折杖法新论 邱志诚 / 139

• 札记 •

- 唐代的弩与弩手 关荣匀 / 158
武康南宋杨氏墓砖札记 刘未 / 166

• 述论 •

唐代信息研究的特色与展望

- 以信息传递的介质、功能为重点 吴丽娱 / 174
概念、过程与文书：宋代两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周曲洋 / 196

• 书评 •

大泽正昭《南宋地方官の主張：〈清明集〉〈袁氏世範〉を読む》

- 赵晶 / 220

蔡涵墨《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 尹航 / 237

Contents

Forum

- An Overview on the Compilations and Publications of Medieval Chinese Tombstone Epitaphs in the Past Decade Qiu Luming / 3
- Miscellaneous Notes on the Study of Stone Inscriptions from the Six Dynasties, Sui and Tang Periods Shi Rui / 26

In memoriam

- Wang Jian and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 Wang Jian's Scholarship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A Perspective from Marxist Historiography Zhang Yu / 35
- A Commentary on Wang Jian'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s to the Households, the Lands, and the Regions of Silk Production Dong Guodong / 56

- A Note on Wang Jian's *Preliminary Studies on the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s on the Land Property in the Tang Dynasty* Huang Zhengjian / 65

- How to Deal with Some Datas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 Reading of Wang Jian's Studies on the Issues about the Acreage of Fields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Huang Chengbing / 72

Research Articles

- Chen Yinque and the Study of Dunhuang Zhao Heping / 82

The Founders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ir Descendants: Observations from
Their Tomb and Burial Materials Lu Yahui / 106

The Embodied Declaration of the Founding of the Song Regime
— The “Zhezhangfa” (折杖法) Revisited Qiu zhicheng / 139

Notes and Essays

Crossbow and Crossbowman in the Tang Dynasty Guan Qiyun / 158
A Note on the Tomb Bricks of the Yang Family in Wukang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Liu Wei / 166

Review Articles

The Features and Prospects of the Study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e Tang
Period: With the Focus on the Media and Function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Wu Liyu / 174

Concepts, Procedures and Government Document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Study of the Double-Tax (Liang-Shui) System Zhou Quyang / 196

Book Reviews

Review: Osawa Masaaki, *Nansōchihōōkan no shuchōō*: “Seimeishūū”
“Enshi seihan” oyomu Zhao Jing / 220
Review: Charles Hartman, *The Make-up of History: Understanding Southern
Song Historiography in the Shadow of the “Learning of the Way” Movement*
Yin Hang / 237

笔 谈



主题 石刻史料与中古史研究

编者按语：

学术之推进，体现在新问题的提出与新材料的发现。出土墓志作为“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证曾是中国中古史学术研究的新方法，史学研究也确曾面目一新。然新旧之义是相对的，时下，当我们运用所谓新技术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时，新学问却收效甚微。虽新见墓志剧增，讨论者亦众，惜其能够呈现新问题之意义者则寡。对碑刻墓志的利用，大多仍滞于实证层面的运用，囿于证史补史一隅，鲜有发覆。如欲拓展碑刻墓志之价值，摆脱其作为传统文献附庸之角色，则需破除固有之思维，重新审视、重新发现。总结检讨已有之学，此其时也。本期笔谈特邀近年在此领域深有研究的两位学者，总结以往碑刻墓志之整理与刊布工作，分析得失，旨在探寻可行之方法，以供读者诸君批评。

十余年来中古墓志整理与刊布情况述评^{*}

仇鹿鸣

十余年来随着新出墓志的大量刊布，围绕墓志展开的研究已成为中古史领域中的热门议题，每年发表的相关论著尤其是对新出墓志的单篇考释可称得上汗牛充栋，大有成为专门之学的气象。本文并不打算评骘目前研究的现状、方法及其得失，^① 也不专门论及每一种新出墓志图录的史料价值，^② 而试图较为系统地梳理十余年来墓志整理、刊布的情况，为学者了解这一数目巨大而且目前每年仍以数百万速度增加的史料门类的形成、快速扩充及其边际提供一个简要的索引。

本文将回溯的起点定于 2005 年前后。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点，与两本书的出版有关，其一是 2004 年出版的赵君平主编《邙洛碑志三百种》，其二是 2005 年出版的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在此之前中古墓志已累积相当巨大的数量，学者也做了系统的整理校录工作。在魏晋南北朝方面，以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为开端，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接踵其后；唐代方面，则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两套并行的大型录文总集：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系列。这一系列整理工作针对的对象主要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出碑志所见中晚唐政治权力变迁研究”（批准号 17BZS130）成果之一。

① 陆扬《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一文对墓志研究的方法与取径已提出了不少深入的意见，收入《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 305 ~ 332 页。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墓志研究要如作者所期待的那样成为一种独立而非孤立的史学研究对象，恐怕不能光靠集合在新史料大蠹下论著数量的堆积，如何形成一些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进而推动方法论的成熟，才是当下更紧迫的挑战。

② 这方面已有不少相关书评的累积，读者自可参阅《唐研究》等相关的学术刊物。

有二，其一是 20 世纪洛阳—西安地区因军阀混战而被盗掘流散的大量北朝隋唐墓志，其二是 1949 年后经过科学考古出土及征集入藏各文管单位、博物馆的墓志。因此，当 2005 年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出版之后，尽管该书是以传世文献为主要爬梳对象，但亦兼及《唐代墓志汇编》失收或出版之后发表的墓志。^① 从当时的估计来看，该书若与清编《全唐文》、墓志总集及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合观，似乎标志着学界已较为充分地掌握了存世唐代文献的全貌。

但恰恰是在此前后，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洛阳—西安一线因盗掘而流散民间的大量北朝隋唐墓志开始浮出水面，渐为学者所知，赵君平整理《邙洛碑志三百种》便是这方面的第一种大型图录。在之后的十余年间，新出墓志数量之多，史料价值之巨大，盗掘过程中对考古信息的破坏、文物流散之严重，恐怕都大大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如果用最简洁的数字加以说明的话，《唐代墓志汇编》及其续集共收录墓志约 5164 方，资料截止于 1996 年。^② 气贺泽保规 2017 年出版的《新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是该书的第四版，《目录》1997 年初版收录唐代墓志 5482 方，随着唐代墓志的大量刊布，先后在 2004 年、2009 年、2017 年出版了增订本，其中 2017 年版收录资料截止于 2015 年末，计有唐代墓志 12043 余方。^③ 即

^① 《全唐文补编》在编纂之初已辑录了部分唐代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出版后为避免重复，编者主动删去这一部分，后又补入了部分新见墓志，因此在体例上前后有所更动，参读《全唐文补编》前言，中华书局，2005，第 9 页。

^②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前言明确记录收墓志 1564 方，但《唐代墓志汇编》仅笼统地说收录墓志 3600 余方，未载确数，加之《汇编》与续集两书有个别重收，因此其确切数字并不清楚。《唐代墓志汇编》与续集的重收问题，鲁才全、吴玉贵、胡可先、曹汛先后撰文讨论，综合性的讨论可参读万军杰《〈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重收墓志释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22 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5，第 215 ~ 235 页。

^③ 由于《新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2017 版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作为一个新的来源栏目收入书中，包含了部分北大图书馆入藏拓本但仍未正式刊布的墓志，同时《目录》从初版开始便将《石刻题跋索引》作为一个单独的来源栏目列出，将历代曾见著录的墓志皆登记在案，导致部分条目有目无志。此外，由于《目录》不收录在各种学术期刊、研究著作、专题论文集中零散发表的墓志，因此《目录》仍不是目前所见唐代墓志完备的目录，据笔者估算目前已经正式刊布的唐代墓志总数在 11000 余方。关于《目录》在收录体例上的优缺点，可参读仇鹿鸣书评，《唐研究》第 17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 599 ~ 603 页。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所见唐代墓志的总量增加了一倍有余，超过了之前一千余年的总和，而其中绝大部分系盗掘所获，不但未经科学的考古发掘，至少半数我们无法确切获知原石的去向，仅能依靠辗转流出的拓本甚至录文展开研究，同时也很难估测未有拓本行世便流入私人之手，之后一直未见天日者的数量。近年来北朝、五代墓志发现、流散的情况与唐代大体相仿，以下首先概述十余年来墓志发现与流散的概况。

一 十余年来墓志发现与整理情况概述

唐代尽管定鼎于长安，但东都洛阳人文荟萃，山东旧族在“两京化”的过程中往往首选迁居洛阳，因此崔、卢、李、郑、王等山东郡姓及北魏孝文帝迁洛后的虏姓高门大多仍选择洛阳安置家族墓地，而卒葬于长安周边的则以唐王朝宗室、功臣及韦、杜等关中郡姓为主，辐射的范围反而较小。因此，洛阳邙山一带自北朝隋唐以来便成为达官贵人首选的卜葬之所，唐人王建《北邙行》中便描绘过邙山一带“今人还葬古人坟，今坟古坟无定主”坟茔层累之景象。因此在墓志发现的数量上洛阳要多于西安。1991 年出版的大型图录《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皇皇 30 册，收录隋唐五代墓志拓本 5000 余种，其中洛阳卷达 15 册，占据其中的半壁江山。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先后整理出版了《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洛阳新获墓志》《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等图录，^① 较为系统地整理刊布了当地文管单位发掘及征集到的墓志。而在洛阳首阳山电厂选址过程中发现的偃师杏园唐墓，共计发掘唐墓 69 座，其中绝大部分未被盗扰，2001 年整理出版了正式的考古报告。除了墓志之外，包含了丰富的考古信息，对于我们认识唐墓的分期、中下层官吏的墓葬及家族墓地的规划等具有重要的价值。^② 令人遗憾的是进入 21 世纪后，虽然

^① 其中《洛阳新获墓志续编》尽管是在 2008 年出版，但录文在 2005 年出版的《全唐文补遗》第 8 辑中大都已刊布。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2001。另参读齐东方《读〈偃师杏园唐墓〉》，《考古》2004 年第 4 期，第 85~90 页。

在各种文物考古期刊上仍有零散简报及墓志刊发,^① 但洛阳及周边发现墓志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盗掘出土，随后通过文物黑市流散各处。其中被公立收藏机构购入规模较大者有两批，一是千唐志斋博物馆所征集，主要通过《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叁·千唐志斋壹》两书刊布了拓本及录文；二是洛阳师范学院陆续购藏了300余方，大凡较为重要者皆已有单篇论文考释，并见载于《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其全部馆藏将以《新中国出土墓志》专册的形式整理公布。其他如洛阳理工学院、偃师商城博物馆等也有少量收藏，其余大部则散落民间，为私人购藏，具体流向难以确估。

对于这样一批数目巨大的流散墓志，十余年来，洛阳当地学者赵君平、齐运通等主要通过对洛阳文物市场中售卖拓片的购求，陆续整理出版了一系列大型墓志图录，成为学者获取资料的主要媒介。其中尤以赵君平用力较勤，其先后于2004年出版《邙洛碑志三百种》，于2007年出版《河洛墓刻拾零》，于2011年出版《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于2015年出版《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合计12巨册。^② 初步估算十余年来仅赵君平一人刊布的便达3000方之多，已近民初张钫千唐志斋规模的三倍，不免让人惊叹隐匿其后的盗墓活动之猖獗，文物流失规模之巨。其实从赵君平所编四种图录书名的演变上，我们已不难窥见盗掘范围的扩大，洛阳事实上也成为周边地区乃至陕西、山西等地被盗出土墓志流散中转的中心。与赵君平同时稍晚，齐运通亦先后整理出版了《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洛阳新获墓志二〇一五》两书，^③ 由于两人收集资料的渠道大体相同，因此刊布墓志的重复率相当高。客观而言，这批数目巨大新出墓志的整理公布，对学术研究有不小的推动，赵君平、齐运通等当地学者长年孜孜不倦地访求流散墓志拓本，使得文物在遭受劫难之后，尚不至于完全散佚，其付出的努力值得尊重与肯定。但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目前两人刊布的几种图录，皆

^① 除了一般学者较为熟悉的文物考古类期刊外，值得一提的是洛阳当地的两个刊物，此前洛阳历史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部发行的《河洛春秋》经常刊布民间的流散墓志，近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创办的《洛阳考古》集刊则成为获悉洛阳地区最新考古发掘讯息的重要渠道。

^② 另据闻《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三编》已编纂完成，即将出版。

^③ 《洛阳新获墓志二〇一五》虽以二〇一五为书名，但实际至2017年才正式出版。

仅影印拓本，未附录文，间或掺入个别伪品，在编次等方面亦有可议之处，对学者充分利用这批资料不免有所妨碍，对此下文还将详论。若从大端而言，赵君平所收数量更多，相对齐备，齐运通两书则在拓本影印质量上有稍胜之处。近年来董理洛阳地区出土墓志较为理想的范本是由毛阳光、余扶危编纂的《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收录唐代墓志 322 方。该书尽管与赵、齐几种图录所收颇有重合，但主要优长之处有三：收录范围明确，仅收录洛阳出土的唐代墓志，不阑入陕西、山西等外埠流入洛阳者；鉴别审慎，编次系年准确，志盖、志石信息相对完整；录文准确。^①

西安的情况较之洛阳稍显有序，无论是对关中帝陵的系统调查，还是在咸阳机场修建及改扩建、西安城区南北拓展与市政建设的过程中，考古部门皆与之配合，展开了大量抢救性的勘探发掘，有不少重要的发现。但毋庸讳言，同时也存在着广泛的盗掘现象，其触角甚至已伸入唐陵周边。20世纪 90 年代以来，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组织编纂了“陕西金石文献汇集”丛书，系统调查了陕西省内各地区所藏金石文献，按地区、单位分册整理出版，至 2014 年《长安碑刻》出版，与中古史较相关者约 10 种，刊布了大量新资料。西安碑林博物馆作为在海内外享有盛名的石刻收藏与研究机构，在早年出版《西安碑林全集》之后，先后在 2007 年、2014 年整理出版了《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两书皆附有清晰的图版与录文，颇便利用。值得注意的是《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虽汇聚其 1980 ~ 2006 年陆续征集入馆的墓志 381 方，但其中半数多是碑林博物馆 2005 年购藏的一批出自山西上党地区的墓志，200 余方，而非出自陕西本省。《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收录 2007 ~ 2013 年入藏墓志 231 方，构成其来源主体的是 2012 年西安市公安机关破获一起重大倒卖文物案件后移交给碑林博物馆的墓志，书中著录入藏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12 日者，皆出于此。可以说，这两部图录的编纂多少都属于被盗掘文物大量流出后的劫余录，虽有裨于学界，但也反映出公立收藏机构在墓志流散浪潮冲击下无能为力。西安公安机关将近年稽

^① 除此之外，由于编者长期在洛阳周边从事新出墓志的调查与研究，对相关情况有切实了解，因此《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前言中所述近年洛阳周边墓志盗掘及流散的经过，颇具参考价值。

查追缴墓志中的另一部分移交给西安市博物院，其中包括了著名的隐太子建成及其妻郑观音的墓志，这批材料经整理校录后，近日已经以《西安新获墓志集萃》为题出版。由于公立收藏机构受《文物保护法》规定及资金使用的限制，民营博物馆成为近年来在文物市场大肆收购新出墓志的主力军。这一方面虽不无保存文物之功，同时在客观上也刺激了文物非法买卖的风气。其中以民营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数量最多，其购藏的范围亦不局限于西安及周边出土的墓志，还包括洛阳乃至山西等地流出的墓志，颇多精品。其馆藏的主要部分经过与北京大学荣新江领导的团队合作整理，已以《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为题出版，共计收录墓志 500 方。其中重要的墓志整理团队成员大多已撰文考释，^① 该书图版影印清晰，录文精审，是近年推动新出墓志整理与研究的成功尝试。其后，大唐西市博物馆陆续又有新的购藏，包括引起轰动的汉文、鲁尼文双语回鹘王子葛啜墓志，^② 目前其确切的馆藏数量仍不清楚。此外，最近出版的胡戟《珍稀墓志百品》延续了《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的编纂体例，辑录刊布新见北朝隋唐墓志 100 方，但这批资料仅是据拓本整理校录而成，原石去向不明。另 2013 年出版《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藏品集锦·碑石书法卷》刊布馆藏石刻 30 种，绝大部分系首次公布，包括由李商隐撰书的王翊元及妻李氏墓志。

除了盗掘流散的墓志外，西安地区博物馆、考古部门近年来亦陆续系统公布馆藏。从史料的价值而言，以《长安新出墓志》《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两书最为重要。《长安新出墓志》中的“长安”系指西安市长安区博物馆，尽管仅是一区级博物馆，但唐代著名的韦曲、杜曲皆属今长安区辖境，故该馆拥有得天独厚的文物资源。书中多数墓志系首次刊布，包括著名的安乐公主墓志及多方重要京兆韦氏、杜氏家族成员墓志，史料价值颇丰。《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收录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2001~2006 年在西安南郊高阳原隋唐墓地发掘所获墓志 113 方，是近年来

^① 《唐研究》第 17 卷“中古碑志与社会文化研究专号”收入的论文大多以西市藏墓志为主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相关研究目录见《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附录《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研究文献索引》。

^② 其中较为集中的讨论见《唐研究》第 19 卷“《葛啜墓志》研究专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仅见的完全依靠科学考古工作形成的大型墓志图录。值得一提的是编者在整理过程中，除了拓本、录文等常规工作外，还专门刊布了每方墓志出土时在墓葬中位置的图片，在每方墓志解题中也简要记录了发掘情况，在正式考古报告尚待整理出版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向研究者提供了墓葬的考古信息，在体例规划上用心颇多。^①

除了引起学者广泛关注的洛阳—长安一线外，近年来另外两个有大量墓志被盗掘出土的区域是临漳、安阳周边及山西长治等地。临漳、安阳周边是中古时期邺城所在地，邺城作为魏晋南北朝中国北方东部的中心城市，东魏北齐建都于此，保留大量的历史遗迹。隋文帝平定尉迟迥起兵后，对相州城进行了彻底破坏，相州因此迅速走向衰落。20世纪初的盗墓浪潮也曾波及邺城，罗振玉曾裒集《邺下冢墓遗文》二卷，并述及当地墓志出土与流散的情况：“墓志出于安阳彰德者次于洛下，顾估人售石而不售墨本。此所录虽已二卷六十余石，而不得拓本不克入录者，数且至倍。”^② 孰料近百年之后，学者依然将主要目光投向洛阳、西安两地，邺城周边墓志发现、流散的经过再次成为不为人所知的黑洞。事实上，近年来在邺城附近发现的东魏北齐墓志数量巨大，涉及人物在《北齐书》中有传者在十人以上，而传世《北齐书》仅十七卷系原文，其余皆是后人用《北史》及唐人史钞所补，新出墓志的价值不言而喻。但这批数量巨大的东魏北齐墓志，除《安阳北朝墓葬》一书收录7方墓志系因南水北调工程展开的抢救性发掘所获外，其余基本是盗掘出土。最早大规模刊布邺城周边出土墓志的是《文化安丰》一书，这本编纂潦草的图录起初不过是地方上为宣传曹操高陵的发现而整理出版的，附有墓志195方，尽管录文错讹极多，但大部分系首次刊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化安丰》一书起初因流布不广，并未引起学者的注意，较早注意到此书价值的是日本学者梶山智史。近年来随着《墨香阁藏北朝墓志》《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墓志》

^① 既往公认墓志整理体例最佳者是毛汉光主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包括拓本、录文、历代著录及研究、整理者的考订等内容，《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的整理工作则提示我们，考古信息也有必要成为将来墓志整理中的重要部分。

^② 《永丰乡人行年录》，附录于《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407页。

的整理出版，我们稍可窥见邺城出土墓志的流向。正定墨香阁藏品较早为学界所知，或可追溯毛远明主编《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校注》所收基本是已刊布的资料，但仍有个别未刊墓志，其中有几方便得自墨香阁。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合作整理出版的《墨香阁藏北朝墓志》一书以墨香阁经手、收藏的墓志原石为基础，收录墓志 151 方，拓本影印清晰，录文精审，成为方便使用的整理定本，而墨香阁所藏墓志的主体便是出自邺城周边。另一家值得注意的收藏机构是大同北朝艺术院，尽管位于大同，但北朝艺术院整理公布的 55 方墓志，除个别出于平城外，其余都是近年出自洛阳、邺城等地，大部分系首次刊布，其中尤以邺城所出者占据大宗，包含不少精品。其中拓跋忠、程暉、宇文绍义妻姚洪姿墓志同时见载于《墨香阁藏北朝墓志》《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墓志》两书，推测其或是从墨香阁辗转流入北朝艺术研究院者。

山西长治一带历来出土墓志数量甚多，《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录长治出土墓志 115 方，占一半多的篇幅。上文已述及《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刊布山西上党地区出土墓志 200 余方，近年山西新出墓志颇多流入洛阳、西安等地，《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等书中皆收录不少。由于长治等地出土墓志的志主身份多系中下层士庶，因此数量虽众，学界措意者较少，仅因志盖上有题刻唐诗的传统而稍引起学者的讨论，并关注其背后的地域文化特征。^① 实际上，山西各地出土中古墓志的数量相当惊人，除了陆续出版的《三晋石刻大全》之外，近年来整理刊布者有《晋阳古刻选·北朝墓志卷》《晋阳古刻选·隋唐五代卷》《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等。前两种编纂以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为依托编纂，为了凸显墓志的书法价值，将拓本制成剪裱本影印，稍不便于阅读，但刊布了不少重要的墓志，如刘珣墓志、王惠太妃墓志是目前所知仅有的两方北汉墓志。后一种虽未收重要人物墓志，但所录 50 方唐志皆系首次刊布。

^① 相关研究可参读梁海燕《唐人墓志盖题诗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 年第 4 期，第 8~16 页；刘天琪《挽歌、铺首、八卦符号与墓志盖题铭——以新发现的晋东南地区唐代墓志纹饰为研究重点》，《美术学报》2011 年第 5 期，第 58~67 页。